

我亲历“华航事件”谈判

访原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斯德

◎ 本刊记者 李立

采访老部长杨斯德的那天，恰逢北京刮起了沙尘暴，

在办公室都能感觉到沙土往嘴里挤，要是说话更是让沙土“长吸直人”。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去采访老部长，对81岁的杨部长来说简直就是折磨，可杨部长竟然答应了。

杨部长是位慈祥、可亲的老人，我们的谈话就在无拘无束中开始了。说起往事，杨部长很高兴，他首先谈到亲自负责处理“华航事件”谈判这段历史，以下就是他的回忆：

“华航事件”发生后，我负责处理在香港举行的谈判。“华航事件”的谈判是对台工作的一次重大事件。在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势下，这件事处理的好坏，将直接关系到对台工作的全局，意义重大。由于中央决策的正确，双方比较顺利地举行了谈判，成功地解决了这次事件，中外震动。这次事件的成功解决，扩大了影响，赢得了人心，打破了台湾当局的“三不政策”（不接触、不谈判、不妥协），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，开启了良好的开端。

谈判的前前后后

1986年5月3日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航）B198号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

飞抵广州白云机场，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，与家人团聚。当时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、机械师邱明志两人，货物22万磅。这就是轰动一时，震惊世界的“华航事件”。

事件发生后，我们及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。飞机着陆的当天即以我民航名义，致电台湾民航，阐明事件性质，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、机、货的处理。台湾方面极力避免与我正面接触，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等与我交涉。中央毫不含糊地坚持“不让第三者插手”。

5月11日，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，重申：“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，并不涉及政治问题。既然是交接，就应当由当事双方直接地、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，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。”我方还明确表示：“如果你们觉得到北京不方便，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，也可以提出来商量。”

我们可以说是仁至义尽，把话说到家了。台湾方面没有任何理由拒绝，被迫于5月13日，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，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。

中央指示，由我、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、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、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，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，并委我以最后决定权。

我们于5月14日离京，15日上午抵达香港，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（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）一道，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。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，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。当晚，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名代表卢瑞龄、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。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，我们遂于15日下午，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，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，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，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。

15日下午，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，台湾方面同意会谈，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，并称华航有给“国泰”的委托信。为慎重起见，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，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，并提出会谈前，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，被台方婉拒。相反，他们提出，会谈时可否让“国泰”派1人参加旁听，作为公证人。另外，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。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

由拒绝，只答应会谈前可由“国泰”1名先生引见一下。

在会谈时间问题上，台方一度有意放风，说我方准备不足，欲拖延至19日开始。我们按照中央部署，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，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，拖延时间反而不利，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，迫台接受。

至于会谈地点，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。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，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。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、1名记录。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。

5月16日，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：向中央发请示电；汇报会谈时间、地点的安排；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；我拟采取的对策等等。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，请示批复。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，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讲。

5月17日上午9时52分，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。“国泰”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，双方握手致意，谦让着进入会场。会谈开始前，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。台方认为，蔡先生是中国人，可以私人身份参加，对外可保密。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，表示引到为止，会谈不要参加。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，遂退出会场。

会谈正式开始。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（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）抢先发言，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，并读了全文。同时，再次问我方，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。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，钟表示，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。

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。随后双方就人、机、货的交接地点、时间和方式进行商讨。我们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，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。台方表示广州可以，但要委托第三者。如直接交接，就在香港。我们未表示同意。台方代表陈恩锦（台华航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企划处处长）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员（包括王锡爵），飞机和货物再商量。我们坚持人、机、货同时交接的原则，同时明确指出王锡爵先生愿意留在大陆，我们尊重王锡爵先生本人的意愿，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锡爵先生。台方对此没有表态。这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、立场和诚意，气氛很融洽。台方只要求与董、邱二人通一次电话，没有其他任何刁难性说词。我们建议，双方互相考虑对方的意见，下次再谈。此次会谈持续了一小时零十五分钟，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。

会谈结束后，我们立即向中央汇报首次会谈的情况，并请示首先力争在广州进行交接，若台方拒不接受，拟同意在香港交接。另外，我们还请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骤，并提出我们的建议。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建议。于是，我们拟定了第二次会谈仍坚持在广州交接的方案。

5月18日上午10时，第二次会谈开始，我方代表张瑞普首先发言，重申了我方坚持在广州直接交接的立场。台方表示在广州交接有困难。台方认为，“双方观念不同，制度不同，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，不合适；而在香港双方都有公司，每天有十几架次的飞机起落，为什么不能在香港

呢？”我方回答说：“香港安全恐怕有问题，目前又是英国管辖。在广州主要是为了交接安全、顺利、迅速，并无他意。”台方代表陈勋伟（华航香港分公司副经理、台湾情治人员）态度强硬地说：“在广州交接绝不可能，用不着再向公司请示，公司已充分授权给我们，再这样下去就没法谈了。”至此，会谈陷入僵局，双方建议暂时休会。回到新华社，我们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。中央指示，拟定在第三次中仍坚持力争在广州交接，若实在不行时，可伺机转入第二方案，即同意在香港交接。

5月19日下午4时，第三次会谈在香港马会大楼九层举行。一开始，台方代表钟赞荣就提出了他们准备好的6个问题：

1、贵方在电报中表示纯属业务商谈，不涉及政治，可贵方一再说这是特殊事件，不比一般商业行为，这是否超出了业务洽谈范围了？

2、贵方一再强调人、机、货同时交接，可人是有感情、有思想、有尊严的，人与物怎能相提并论呢？

3、贵方扣留我机员十几天，直到现在没见露面，我们要求通个电话也不答应，原因何在？既然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，为什么不能尽早释放？

4、贵方能将飞机从北京飞往广州，为什么不能飞往香港？香港启德机场每天有100多架次起落，可贵方却强调安全问题，请问是何原因？

5、贵方比喻说家人丢了小孩。我方机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，小孩定义是什么？放飞机还有些技术问题，可放人没有技术

问题，很简单嘛。

6、请问国际上有哪家航空公司扣住人、机不放呢？贵方事先划定了圈圈，提议不能变动，不考虑我们的困难，这样拖下去谁负责呢？

对于台方提出的这6条，我们明显地意识到，他们的目的是想先把人要回去。张瑞普同志回答说：“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事件，是指这架飞机没有按正常航线飞行。他的航线本来没有广州，但是在广州降落了，这就是特殊问题。人、机、货是一同到的，所以我们主张一起交还，这并不是把人和物相提并论。”随后，我们不与台方提出的6条纠缠，及时把会谈引入正题，催问对方是怎样考虑我方关于广州直接交接的意见的？他们继续坚持前二次的观点，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和立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认为转入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于是，张瑞普同志发言，重申了我们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。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，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，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、程序、手续等问题。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。台方毫无准备，答应带回去研究。我们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，他们表示“慢慢来”。

在第三次会谈中，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，台方十分紧张，手都发抖。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，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台方情绪明显好转，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。会谈结束后，我们一方面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，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，舆论上争取了主动。

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，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。整个会谈比较顺利，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。台方表示，交接书很好，可以一字不改。至于会谈纪要，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。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“台湾”二字，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。第二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，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。第三，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，“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，应基于人道立场，并按民航惯例，尽速交回飞机、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。”第四，将“友好协商”改为“业务性商谈”。

经过协商，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、二、四条建议。但第三条我们不同意增写，台方也没有坚持。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，并解释说：“你们可以不接受，也可以不听，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。我们这样做，回去好交待，请贵方理解。”台方单方面签了字，我们未加理睬。会谈纪要签字后，双方鼓掌通过。

随后，台方对我们热情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，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。我们说，都是同胞兄弟，都是一家人，这点钱就不用还了。我们只说两岸同胞之间的浓浓亲情，淡化了政治，赢得了人心。台方对此也很感动。

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，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，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，在机上办理了交接，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、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

单，递交给对方，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。交接完毕后，张瑞普祝董、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，并赠送他们礼品。他们表示心意领了，但礼物不能接受。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，双方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。自此，历时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，圆满地画上了句号。

众说纷纭话“华航事件”

“华航事件”的圆满解决，受到了海内外的普遍赞誉，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反响强烈。

香港《中报》发表社论《通向历史的转折点》一文认为，“从不接触到接触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。”香港《信报》发表短评称，“这场谈判的表面意义是华航成功地取回人、机、物，而深层意义则是恢复了台湾当局对与中共谈判的自信心。”香港国际研究所所长黄学海说：“这次货机外交相当于当年的乒乓外交，促成中美建交一样，虽然过分敏感的政治接触短期内不会有突破，但一定会掀起台湾内部年轻的一派及人民，要求和中国大陆的亲友沟通或加强科技、文化、工商业的联系，预期蒋经国在衡量轻重之后，对所谓‘三不’政策会有所改变。”

台湾舆论认为，“谈判有益，有建设性。”“华航、中航虽然动机不同，但在香港举行会谈，标志着海峡两岸30多年的隔绝被打破，两岸首次面对面地谈判，这是一个突破，引起世人瞩目。”

台湾各界人士反映强烈，台“立法委员”谢学贤在向台湾“行政院”提出书面质询中说，货机机长王锡爵说他飞到大陆是为了探望高龄老父。因此，出现这个



杨部长关注台湾问题，希望两岸早日统一。

事件，是台湾当局禁止民众回大陆故乡探亲造成的恶果。他指出，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思乡思亲情切，基于人道立场，应考虑准许他们回乡探亲。

“立法委员”萧瑞徵认为，事件发生后，台湾当局坚持不接触，不谈判，可能在国际上留下顽固保守、漠视人权的形象。

“立法委员”黄河清提出，如果有关方面仍然因循以往的僵化做法，恐怕不会有效。这个事件如果处理不当，对台湾航运前途将有关键性影响。他认为台湾当局应以实际为着眼点。

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林洋港说：“华航事件谈判是民间性质，但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，各方面反映都不错，国外反映比国内好。”林称这次谈判表明中共对台政策已有变动，在谈判中始终采取务实的做法，比较尊重台湾方面的意见。台湾内部有人提出，既然华航事件可以这样解决，那么统一问题也可以试着办，台湾可以提要求，开价钱跟大陆谈判。台湾一情治人员表示，原以为中航会提出在北京交接，改在广州已是松了一口气，最后同意在香港，更是放下了

心。经过这次事件，今后双方接触还是有机会的。

世界华人也纷纷发表评说。张旭成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）认为，人货能顺利返回，这是华航的所得，而以后两岸双方在不同的场合有所接触，似为不可避免。

田弘茂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）认为，台北此次授权华航谈判，打破以往作风，处理问题甚是弹性，应该有正面的评价。“华航事件”后，民众可能要求“政府”更开放、更具弹性，如探亲、旅游、贸易、通信等问题，“政府”应妥谋对策。

熊玠（美国纽约大学教授）认为，中航同意在香港交回人、机是一个让步，中共此次谈判的大原则，主要还在于鼓励台湾及海外支持台湾的人士，建立对谈判的信心。“华航事件”戏剧性地显露出战乱分离、家庭联络的问题。两岸公司与公司能够接触，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两岸民众之间的接触，让那些因战乱而分离的人们共享天伦呢？

丘宏达（马里兰大学教授）认为，基本上，对台海紧张、缓和的看法，是台北与华府政策最大的歧异。台北某些人士只想维持台海情势紧张的形象，以建立其所期望的“反共心防”，而美国则希望台海情势缓和，以维持当地政、军、经的稳定，这项基本歧异仍有待台北妥善提出对策。另外，王锡爵个人因想家而飞往大陆的原因，台北不宜一味避讳。否则，对类似王锡爵这种个人行为的发生，就很难妥善处理，台北方面对此应力求突破才是。

国际上也很关注这件事。美国报纸报道，大陆方面一直采取低调子，实事求是予以解决，没有大做宣传，以谋求政治好处，这是问题获得圆满解决的根本原因。美国驻香港官员普遍认为，中国在处理“华航事件”上干得非常漂亮，合情合理，其诚意令人敬佩。日本和南韩也很重视这次会谈，认为我们的目标在于建立直接接触，其它均属次要，而且目的达到了，使台湾当局的处境十分被动。

我现在对“华航事件”的报道还记忆犹新。记得有媒体是这样写的：“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，看到37年未曾见面的儿子时，竟不顾年迈向儿子“冲”去。王锡爵更是百米赛跑，紧紧地抱着满面沧桑的父亲，俩人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久久不能自己。在场的人也都感动得流下了喜悦的泪水。”港澳台和国外媒体的大量及时的报道，给我们的声援之大，是我们始料不及的。

“华航事件”已过去10多年了，但这次事件对对台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。我现在虽然离开了对台工作的第一线，但一直关心台湾问题，关注两岸形势的发展。我希望两岸尽早打破目前的僵局，通过谈判寻求问题的解决，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。■

杨斯德简历：（1921年10月——现在）山东滕州市人。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，陆军、空军师政委，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，总政联络部副部长、部长。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。中共中央对台工作机构主任，全国政协常委、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。中共十三大、十四大代表。